

## 原红塔集团董事长

## 褚时健狱外再创业种数千亩冰糖橙

曾因贪污被判无期徒刑的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保外就医后再次创业,投身水果业。褚时健的果园占地2400亩,共有果树34万棵。褚时健说:如果自己这辈子还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的话,那就是真诚。

褚时健的果园是绿色的王国,每一位初来乍到的客人都因此而沉醉。高高的艳阳、清甜的花香,这浪漫的场景和一位老人紧密相连。褚时健和他的老伴马静芬信守诺言,第一次相对正式地邀请部分亲朋好友参观了自家的果园,这或许就是褚时健骨子里自信展示,而且这位82岁的老人,这次终于为自己为什么要不辞劳苦开辟荒山搞果园给出了最真实的答案。

## 种2400亩冰糖橙,带领农民致富

褚时健的果园位于云南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附近的两片山头。21日中午,褚时健和他的老伴马静芬邀请亲朋好友,参观打理多年的园子。春天的果园里,处处洋溢着清香,每一棵橙树上,白色的小花次第相连。

烈日下,褚时健用厚实的双手亲抚一棵橙子树,并摘掉了那多出来的新长出的枝丫。

褚时健的园子里有200多名工人,他们都来自附近的山区。农户称,每个在这里劳作的果农,都能拿到在家务农10倍左右的收入。因为实行承包制,果农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

这是褚时健第一次相对正式地邀请客人参观自己的果园,所以当昆明卷烟厂曾经的两任党委书记置怡静与何志禄站在果园里的山头时,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我知道他在搞果园,但想不到面积这么大。”褚时健幽默地回答说:“你眼睛看到的还只是很少的那部分!”这样的对话耐人寻味,别有一番深意。

褚时健的果园总面积共有2400亩,有34万棵果苗,他说,这样的规模在全国来讲,并不是特别大,“我不追求数量,

我只追求质量。”而对于多年的低调,他说:“质量好了,口碑就好,所以我从不主动宣传。”

这样的话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数十年以前。上世纪60年代,褚时健在戛洒镇的一个小糖厂担任了10年左右的厂长,后来才跨入烟草行业。之后,褚时健为烟草行业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狠抓烟叶的质量,为云南的烟草行业一跃成为国内的领头羊出了一把力。

褚时健的二次创业再次选择在这里并不是偶然,他说:“我熟悉这里的气候,这里也有很多我熟悉的人。”在外人看来,这其中或许还有一些乡土情结。如今褚时健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品牌。不久前,昆明一些经销商打出了“褚时健种的冰糖橙”的广告语,销售异常火爆,这让褚时健本人都始料未及。

## “真诚是我成功的基础”

一封举报信将褚时健拉入了其人生的低谷。1995年,中纪委收到一封举报信,反映河南洛阳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取得卷烟指标。紧接着云南省委便着手调整玉溪卷烟厂的领导班子,褚时健显然没有意识到近在咫尺的“危险”,后来还走得更远。



褚时健亲抚一棵橙子树,摘掉了多余的枝丫

1995年,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红和妻子马静芬分别被收审。一年后,褚时健被监视居住,并于1997年7月正式被捕。1998年9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审褚时健贪污案。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

2002年,70多岁的褚时健因患严重的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也就是从这年开始,他转身投入水果行业。如今,82岁的褚时健精神矍铄,走路稳健有力。

褚时健的白衬衫有点发黄,卷起的袖口有黑色的污渍,他说,自己身上的衣服都是廉价货,而且他没有修边幅的习惯,以前去美国,他也坚持不打领带。

褚时健说,如果自己这辈子的话,那还是真诚,他用诚心感染周围人,从而一度缔造了自己的烟草帝国,同样,他再次用诚心为实现自己二次创业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并声称要带领园中打工的农户一起走向富裕。

不少人对褚时健提议,应该出本个人自传的书,但他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他认为,如果要留下精神上的遗产,倒是很希望有本书留给后代看,如果有一天,褚时健的后代有了比他更杰出的人物,大家如果认为是因为受了他的影响,就心满意足了。

## 东借西凑1000多万元,明年就能还清

记者:冰糖橙跟其他橙类相比有什么特色?

褚时健:其他品种的橙子一般有甜而腻、塞牙等不足。我们种的冰糖橙做到了清甜、水分足,因为施的都是无公害的有机肥,所以有益于身体健康。我们种的橙子所含的糖酸比是18比1,其他橙类是很难达到这个标准的。

记者:发展果园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褚时健:主要靠以前积累的人脉和自己的人品,东借西凑来1000多万元,投入了果园基础、发展建设。估计今年,最多明年,这钱就能还清。

记者:对自己的果园是怎么进行管理的?

褚时健:分配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实行家庭“分片”承包责任制,充分发挥农户的主观能动性,实行多劳多得。

记者:技术方面怎么解决?

褚时健:主要是加大科技投入,进行科学管理,果园有专门的技术员,我也给他们进行技术指导,如果园的剪枝、施肥、除虫等。

记者:农户的收入如何呢?

褚时健:去年收入最高的

农户家庭达到了24000多元,最低的也有12000多元。这比他们平常做农活家庭2000多元的年收入,要高好几倍。收入的好坏,直接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性。

## 为发展果园,通宵学技术

记者:二次创业为什么选择种植冰糖橙?

褚时健:我弟弟以前也是搞水果行业的,从他那里了解了中国水果行业的相关情况,美国的水果一直在世界前列,所以我就想到了搞水果。我尝了很多冰糖橙,后来发现橙子含维生素多,吃了对身体有益,又容易储存,所以就下狠心种这个果子。

记者:你以前精通橙子吗?

褚时健:懂是懂一点,但谈不上精通。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业、对土地上的事情还是懂一点的。

褚时健老伴:他“出来”后着手种橙子,天天研究种植技术。如果遇到橙子出了什么问题,不管我怎么催他,他一个晚上都不会睡,看书看通宵,直到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虫害、病害他摸索了好几年,现在比精通种植业的技术员,还懂得多。

## 是不是果王,不是我说了算

记者:你说自己弄果园是闲不住,可这应该不是真正的答案,对吗?

褚时健:以前我在玉溪烟厂当厂长的时候,每天都要干12个小时。我对员工说,你们干8个小时,我就给你们8小时的工资,干12个小时,我就给你们14小时的工资。工人的积极性就这样调动起来了。我说我闲不住这点是没有错的,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晚年

有个保障。

记者:以前你是公认烟王,现在是儿子瞧王吗?

褚时健:社会都是以成论英雄的,是不是果王,不是我说了算。我的果园还需要再努力,目前的产量在全国不是最大的,但我应该做到最好。

记者:您是怎样打造冰糖橙品牌的?

褚时健:前两年我们一直很低调,一个是为了修炼“内功”,空下时间潜心钻研,发展橙子种植。现在条件慢慢成熟,我们正在加强打造自己的品牌。现在我们很少宣传,主要是通过自身高质量的产品,去撬动市场,让老百姓自己去评价。

记者:家里人支持你现在的事业吗?

褚时健:我老伴特别支持。只是儿子瞧不起,也不肯学,不想继承我的事业。

## 做事业需有野心,但不能脱离实际

记者:你的人生大起大落,对于年轻人,你能不能教他们如何面对挫折?

褚时健:遇到挫折的时候,要积极对待,一定要心宽。人生不要有太多计较,要向前走,要相信一年比一年好。

记者:作为男人,必须有野心吗?

褚时健:人啊,对很多东西的希望值最好不要太高,不要计较过多,计较过多了,上级处不好,左右有舍处不好。但人必须有野心,没有野心不行,这个野心是有基础的,不能脱离实际,也要有基本的道德。现在我想清闲了,棱角磨得差不多了(笑)。

记者:你现在的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褚时健:以前是喜欢抓鱼、打猎、打篮球。现在是种菜、看报纸、看杂志。据《生活新报》

## 农妇毒死丈夫 村民联名递求情信

安徽省灵璧县一个名叫邱菊的农村妇女,用农药毒死了因遭遇车祸而成为植物人的丈夫王佩群。

可当民警要带走邱菊时,王佩群的家人和数十位村民还联名给公安机关递交了一份令人心酸的“求情信”:

“王佩群成植物人后,(邱菊)为使丈夫不再痛苦,一时糊涂之下,使用农药结束了丈夫的生命……但是鉴于她在此之前,对老人非常孝顺,对两个年幼的孩子非常疼爱,只是为了结束丈夫的痛苦,一念之差犯下罪行。被害人的亲属对此都能谅解,恳请司法机关对邱菊能够从轻处罚,年迈的老人和两个孩子更需要邱菊的照顾,他们在盼望着邱菊能早日回来共同维持这个家……”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实际上,事件的主人公们在亲情、道德和法律三条跑道上已经跑得筋疲力尽。然而,情与法的不断交织碰撞,却让他们不知如何选择,最终酿成了这起悲剧。

## 妻子给植物人丈夫下毒

悲剧缘起于一场车祸。

王佩群是他们家兄弟6人中唯一的男性,但却从小患上小儿麻痹症。1997年,王佩群打工时认识了贵州人邱菊,并将她带回灵璧老家成婚。二人生有两个男孩,大的12岁,小的才5岁。村里人说,王佩群和邱菊很少吵架,“王佩群腿不好使,邱菊成了这个家庭的支柱。”去年10月初,王佩群发生车祸,成了植物人。这个家瞬间天塌地陷。

成为植物人的王佩群只有眼睛还能略微转动,呼吸依靠的是一根喉管,吃饭靠的是接在鼻孔里的两根胃管,一日三餐,只能用一根粗针管注射流质食物进胃管里。医生告诉王家人,王佩群过得也许还好,有一两年时间,过得不好,说话间就可能不行了。

出于对亲人的爱,近半年来家人一直悉心照顾着王佩群。邱菊每天都要专门给丈夫做饭,她还经常请附近的医生到家里来治疗、吊水。但是,王佩群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随着时间的推移,邱菊和家人的希望逐渐变成了绝望。与王佩群同村的治保主任王佩合告诉记者,前些时候,邱菊找他说自己太难了,王佩群每天的“尿不湿”就要花费六七块钱,再挂两瓶水,每天要有百余元的花费,车祸赔偿的钱连看病带还账,已剩下不多了,两个孩子又小,无用的花费不如留给孩子将来上学。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我什么也没法说,何况从亲情和道德

上讲,也不能放弃治疗。”王佩合说,当时他只能安慰她,他万万没想到,更大的悲剧还在后头。

今年1月29日20时许,灵璧县公安局姜庄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该镇王赵村村民王佩群被自己的老婆用农药毒死。姜庄派出所所长张兴立即带领民警赶赴现场。在确认报警属实后,民警控制了犯罪嫌疑人邱菊。

据邱菊交代,当天下午4点多,她偶然发现两瓶没用完的农药,就将其中的一小瓶注入了给丈夫食用的管子。邱菊说,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喂进去,她让大儿子喊丈夫的家人来帮忙。

大约过了20分钟,王佩群脸上开始冒汗,家人也发现王佩群身体有异常。

“我非常害怕也非常后悔。”邱菊说,她赶忙给附近的医生打电话,电话打不通,就骑自行车去医生家,但医生不在家。等她再回到家时,王佩群已经死亡。邱菊向家人和邻居承认王佩群是她毒死的,让家人报警。

## 毒夫案引发广泛同情

灵璧县刑警大队大队长王敏告诉记者,犯罪嫌疑人邱菊认罪态度很好,对毒死丈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被刑拘。

“他这个样子受罪,我们也受罪。照顾丈夫要花钱,生活也要花钱,他死了,就可以把钱都留给孩子。”邱菊在供述投毒动机时说,确实是看不到希望了,才做出这样的傻事。邱菊所供述的动机被王敏称为“善良的动机”,但不管怎样,她的行为把

自己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出人意料的是,王佩群的家人并不怪邱菊。

王玉海说,事发后他们一家人并没有急于报警,只是后来妻子要自杀,他们担心再出事才报警的。

“我们带人走的时候,邱菊的婆婆抱住她不让我们带走,哭得十分惨。”姜庄派出所所长张兴说,随后,王佩群的家人和村里人联名写求情信,希望从轻处罚邱菊,好让她回家照顾孩子。他表示,公安机关会如实将这些情况向公诉机关反映。

“谁会忍心杀死自己的亲人?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人会用死来向命运抗争。”王赵村治保主任王佩合说,王佩群发生车祸后,除了赔偿以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救助,这个家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压力可想而知。

邱菊毒夫案在当地引发了广泛争议。同情者认为,邱菊的做法虽然不可取,但面对植物人丈夫,一个农村妇女采取极端手段结束丈夫的痛苦,并且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应该得到从轻处罚。

联名求情的村民认为,邱菊被抓意味着这个家彻底完了。“邱菊的老家远在贵州,自己也才30多岁,如果她在拿到丈夫的车祸赔偿金后一走了之,根本不会被人找到。但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非常负责任地将家里的欠款一一还清,甚至有人记不清曾经借给她多少钱,她也会尽可能多地还上。而剩下的钱她全部存到了银行里,留给孩子生活、上学用。”村民们认为,邱菊毒

死植物人丈夫是出于无奈。

王赵村党支部书记卓传军说,由于王佩群的情况是车祸造成的,并获得了赔偿,他的治疗不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统筹补助。因为,根据相关规定,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造成的一切费用,不属于“新农合”大病统筹基金补助的范围。

卓传军认为,“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但仍存在门槛太高、农民受益面不广等问题。

“我感到很遗憾,我正在准备帮王佩群申请低保和困难救助,却发生了这场悲剧。”王佩合解释说,王佩群的车祸发生在去年10月,由于低保和困难救助的申报每年只有一次,发生车祸时当年已经审批结束,无法申报,所以王佩群没有得到救助。

对于王佩群既无法享受“新农合”又无法得到社会救助的问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从发认为,像王佩群这样的家庭,社会救助体系应当建立绿色通道。

“不要说像邱菊这样的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属,就是有相当经济来源的家庭,长期下来也无法承受。”胡从发说,“当然,像王佩群这样的重大伤残,有车祸赔偿,对于农村合作医疗来说,存在着公平原则问题,但这不能成为由一个家庭承担全部负担的理由。”

胡从发认为,因伤、因病而致贫的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针对这类人群,同样需要建立专门的救助、治疗机制。

比如,比照散居精神病患者的情况,将植物人等重大伤残纳入医疗救助范畴给予补助,由政府和社会建立专门的救治、护理机构,扩大农村大病统筹的范围等等。

“我现在最牵挂的就是两个孩子……我对不起你们全家老少,等我回家以后会好好孝敬您的。”这是邱菊在看守所里写给婆婆的信,等待她的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 “安乐死”应尽快提上立法日程

类似“邱菊毒夫”案中的植物人病患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此案的一个警示是,有关“安乐死”的利弊,必要性等问题不能停留在民间讨论层面,而应该尽快提上立法讨论的日程。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从发说。

“可能这个叫邱菊的农妇连‘安乐死’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如果‘安乐死’不存在法律空白,也许邱菊就不会做出毒夫的极端行为。”胡从发说,从亲情的角度出发,谁都希望把亲人治好,但如果是救治无望的病,比如植物人,我们的社会管理应该设置好处理的途径,不应当让像邱菊这样的亲属用犯罪的代价,来解除病痛对亲人、家庭没有尽头的“绑架”。

胡从发认为,不少植物人的亲属明明知道救治无望,但碍于道德和社会的压力,也只能痛苦地挣扎。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只有制度、法律的规范,才能真正解救他们。据《法制日报》